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二 期
2006年11月 頁33~58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

張 隆 志**

摘 要

民俗學為歐洲近代學術的一環，而東亞地區民俗學傳統的形成，則與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歷史有密切關聯。本文以 1900 年代臺灣舊慣調查事業與 1940 年代臺灣民俗保存運動為例，探討日臺殖民知識和權力關係的轉變，如何使得文化成為臺灣殖民地政治的重要場域，並反映近代臺灣的殖民地學術脈絡與文化政治過程。筆者透過舊慣與民俗兩種殖民知識類型和文化政治脈絡的比較，說明臺灣民俗研究的特殊發展軌跡，亦即從日治初期具有殖民地文化治理和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轉變為戰爭動員時期對於地方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民俗研究。而相較於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民俗學的連續發展，戰後臺灣的民俗研究則由於殖民學術情境與去殖民過程的雙重因素，出現學術傳統斷裂與交叉移植的現象。

關鍵詞：舊慣調查 《民俗臺灣》 近代知識生產 殖民地文化政治

95.6.20收稿，95.10.23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世變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整合型研究計畫之成果。部分內容曾發表於韓國翰林大學「東アジアの近代と民俗学の創出」研討會（2004）及日本東京大學「近代東亞的知識生產與轉換」研討會（2006）。筆者感謝陳偉智、李季樺與吳叡人博士的協助，南根祐、垂水千惠與三尾裕子教授的評論，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文中的意見和可能錯誤，均由筆者負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民俗研究（Folklore studies）作爲歐洲近代學術的一環，有其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民俗調查與研究，一方面成爲文化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知識活動，一方面也成爲民族國家建構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民俗研究除了批判西方啓蒙現代性和現代化論的特徵外，民俗學本身亦成近代化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值得注意的是，東亞民俗學傳統的形成，與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歷史有密切關聯。而東亞地區的民俗研究，更由於近代日本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的背景，而呈現出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雙重歷史特徵。[1]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1895-1945）爲例，探討其如何成爲日本殖民地調查和近代知識建構的新學術對象。筆者的主要問題是：殖民地臺灣如何成爲帝國日本的知識對象？臺灣民俗研究在日本殖民論述和近代學術發展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和功能？而「民俗」作爲日本殖民地文化政治的場域，發揮了何種政治和社會效應？

本文的主要研究個案，爲1900年代的臺灣舊慣調查事業，以及1940年代的臺灣民俗保存運動。關於《臺灣慣習記事》與《民俗臺灣》等代表性機關刊物和人物言論，學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2] 筆者的分析焦點，則在於「舊慣」與「民俗」作爲殖民知識類型和文化政治的比較意涵。並透過兩者的對照，說明殖民知識生產和權力關係的轉變，如何使得「文化」成爲臺灣殖民地政治的重

[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Stephen Vlastos, ed., *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 在舊慣調查方面，如 Timothy Tsu,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old customs'", in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London: Curzon, 1999）, pp: 197-218；鄭政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1896-192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在民俗臺灣方面，如王昭文，〈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陳豔紅，〈領臺時代の臺灣と日本；《民俗臺灣》を中心に〉，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博士論，1999 年。Tsu Yun-Hui, "For Science, Co-prosperity, and Love: The Re-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Folklore and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n War," in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Wartime Japanese Anthropolog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Osaka, Japan :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3.）, pp. 189-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場域。全文主要論點爲，臺灣民俗研究從日治初期具有殖民地文化統治和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轉變戰爭動員時期對於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民俗」研究，實反映近代臺灣的殖民地學術脈絡與文化政治過程。另一方面，相較於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民俗學的獨立壯大，日治時期萌芽的臺灣民俗學傳統，則由於戰前殖民學術情境與戰後去殖民過程的雙重歷史背景，並未能延續發展。使得戰後臺灣民俗研究，呈現出傳統斷裂與交叉傳遞的特殊發展軌跡。

二、殖民論述、文化政治與臺灣民俗研究

臺灣是位於歐亞大陸和太平洋海域交會的島嶼，自17世紀以來，經歷了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及日本等政權的統治。臺灣的住民除了分佈在西部平原和丘陵地帶的閩粵漢人外，還有活躍在中央山脈的南島原住民，及混雜在漢人社會中的平埔族群。[3]作爲清帝國邊疆的臺灣，在1860年開港貿易後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並在1875年後成爲中國洋務現代化的重要區域。[4]1895年馬關條約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並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經歷了資本主義化的過程，[5]以及殖民地近代化的政治社會變遷。[6]此一社會構成的多元性與歷史經驗的複雜性，是臺灣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前提。[7]在臺灣多族群社會和多重殖民史

[3]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1987）。

[4]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戴國煇，〈晚清期臺灣的社會經濟〉，《臺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臺北：遠流，1985），頁 27-88。

[5]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88）；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Chih-ming Ka,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6]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1990）；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臺灣大學，1986）。

[7] 吳密察，〈臺灣の植民地型近代化への再認識〉，比較史、比較歷史教育研究會編，《黒船と日清戰爭》（東京：未來社，1996），頁 289-2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認識基礎上，以下先就本文的研究假設和方法論立場做一說明。[8]

近年來關於殖民主義與文化的研究，已發展成爲重要的學術領域。[9]民族主義與後殖民研究學者均指出，在十九世紀後期帝國主義擴張和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除了軍事外交的征服或政治經濟的支配外，文化知識的建構扮演了關鍵角色。[10]而近代化過程中，各種新傳統和論述的發明與傳播，更是塑造想像共同體和國族認同的重要途徑。其中尤其是殖民人類學、殖民論述與帝國統治間的複雜關聯，更受到學者的重視。[11]另一方面，在後現代和後殖民思潮的影響下，學者除了批判現代化理論的西方中心色彩，更從多元現代性和另類現代性的觀點，重新探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面對「現代」的複雜歷史過程和回應。[12]

從比較歷史的觀點而言，民俗學作爲歐洲近代學術的一環，有其源於德國浪漫主義等思潮的特殊社會文化脈絡。而東亞地區民俗學的發展，則與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戰爭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聯。作爲唯一非西方殖民帝國的日本，除了以軍事外交和政治經濟進行擴張和支配，亦透過東洋史與殖民學等近代學術的發展，建立其在東亞的殖民論述和文化霸權。[13]

---

[8] 張隆志，〈殖民現代性分析與臺灣近代史研究〉，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頁 133-160。張隆志，〈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359-383。

[9] Niclolas Dirks ed.,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Bernard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0]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1979);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1]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Surrey: Curzon1999; 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 (1997): pp.163-183.

[12] Stuart Hall et al. eds.,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6)；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俗研究作爲東亞近代化過程中「被發明的傳統」，一方面是中韓各國建立民族認同與知識啓蒙的重要途徑，一方面則成爲日本殖民論述與文化統治的知識基礎。上述歷史背景使得東亞地區的民俗研究，除了批判西方啓蒙現代性和現代化論的一般特徵外[14]，更呈現出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雙重性格與複雜動態[15]。以下試以日治初期臺灣「舊慣」調查與戰爭末期的「民俗」研究爲例，說明日本殖民論述的發展與轉變，並探討其所反映的殖民地文化政治意涵。

三、新領土統治與殖民地調查：臺灣慣習研究會與《臺灣慣習記事》

對於臺灣地方民俗的紀錄與描述，並不始於日本殖民時期。明清中國方志和文人筆記，如17世紀郁永河的《裨海紀遊》、18世紀黃淑璥的《臺海使槎錄》及19世紀陳盛韶的《問俗錄》中，均有關於臺灣「風俗」及「番俗」的描述。而在西文文獻方面，如荷蘭時期對於臺灣南部西拉雅平埔原住民的報導，以及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行者對於臺灣島嶼及住民的文字與影像紀錄，都是臺灣社會文化史的重要資料。[16]

近年來明清中國史學者開始對於「風俗」的歷史詞彙與相應的西方概念，進行反思和比較。[17] 而在日本近代史的脈絡中，由傳統的「『風』俗」語境轉

California Press, 1993); 姜尚中，《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彼方へ—近代文化批判》（東京：岩波書店，1996)。

[14] Alan Christy, *Representing the Rural: Place as Method i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Native Ethnology, 1910-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Marilyn Ivy, *Discourse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15] Tani E.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16]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1）。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灣史》。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17] 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13：3 (2002):1-21； E.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換成近代以降的「『民』俗」研究，本身即透露近代國家力量介入的影響與轉折。日本民俗研究由原先明治中後期保存記錄地方風土民情的目標，一變而爲大正年間文明／國民文化論爭的焦點，又再轉折成戰爭期間形塑日本國民文化的養分。[18]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臺灣民俗研究，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殖民學術雙重脈絡下所展開。相較於中國與日本內地，日治初期臺灣的殖民地調查事業與知識生產，則是以帶有文明啓蒙色彩的「舊慣」乃至於「迷信」等詞彙，作爲其主要概念範疇[19]。以下試就日本殖民地調查的主要機構和成果做一介紹，並討論臺灣慣習研究與殖民地政治學術的特殊關聯。

（一）日本官方殖民地調查的展開：臺灣慣習研究會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慣習研究會成立於1900年10月，以兒玉源太郎總督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爲正副會長，覆審法院院長鈴木宗言爲幹事長，並發行期刊《臺灣慣習記事》。本會雖爲會員制的民間團體，但主要成員實以臺灣總督府、法院和各級地方官吏爲主，民間律師醫生及金融界人士爲輔。會員最多達到二千餘人，並有內地人士入會，1907年8月解散。

1901年10月，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196號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會長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擔任，第一部由岡松參太郎及織田萬負責法律制度的調查，第二部由愛久澤直哉與持地六三郎負責經濟制度的調查。1909年後增設番族科，著手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固有習慣，至1919年解散。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出版成果，包括了《臺灣私法與附錄參考書》（1903-11）與《清國行政法》（1902-15），以及《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1913-1921）、《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調查報告書》（1915-1920）、以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1921）等重要論著。[20]

---

[18] 瀨川清子、植松明石編，《日本民俗學のエッセンス：日本民俗學の成立と展開》（增補版）（東京：ペリかン社，1994）。此一論點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示。

[19] 李季樺，〈他者の視線からみだ 19 世紀末から 20 世紀初頭の臺灣における「迷信」の生成：臺灣の舊慣、民俗誌史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現代臺灣研究》18（1999）：33-50；李季樺，〈文明と教化——19 世紀臺湾における道德規範の構築と変容〉，東京大學博士論文，2006。

[20] 山根幸夫，〈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の成果〉，《論集：近代中國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76），頁 79-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臺灣慣習記事》作爲「臺灣慣習研究會」的機關誌，自1901年1月創刊，1907年8月停刊，共發行7卷80冊。收錄有關清代臺灣制度、慣習與民俗等文章、法令及實例。文章的來源約可分成三種：一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報告，二是會員個人對於臺灣漢人風俗習慣的調查報告，三是會員個人對於「生番」的論著。內容包括臺灣歷史地理、動植物、教育語文、宗教民俗、原住民、人口戶口調查、舊慣調查、法制慣習、經濟慣習、公文契字、印譜書籍等各類目，尤其以法制經濟慣習爲大宗。[21]

從成員組成及活動性質而言，「臺灣慣習研究會」可說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輔助機構。相較於側重臺灣經濟與法律制度研究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慣習研究會」的調查則以漢人生活習慣與風俗，如分類械鬥、民間信仰、歲時祭祀、生命禮俗、民俗器物等爲主，並旁及臺灣原住民的調查和報導。

（二）日本殖民地人類學與臺灣原住民研究

除了臺灣總督府的官方調查事業外，日本殖民初期臺灣調查研究的另一重鎮，是來自東京帝國大學和東京人類學會的學者。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展開，是以伊能嘉矩（1867-1925）、鳥居龍藏（1870-1953）、田代安定、森丑之助等先驅者的臺灣學術探險爲起點。日本於1884年成立東京人類學會，1895年日本領臺後，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講座教授，同時也是東京人類學會領導者坪井正五郎（1863-1913）指出，殖民地研究調查新領土上的人種、體質與風俗習慣爲日本人類學者的急務。[22]

同年，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與田代安定來臺展開實地調查，並在臺北成立臺灣人類學會，以研究臺灣人種的體質風俗習慣爲宗旨，修正過去以支那人與熟蕃生番三分法的族群分類。1900年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的《臺灣蕃人事情》，首次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分類架構。另一方面，1902年來自於東京帝國大學的鳥居龍藏，出版《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成爲第一部臺灣人類學民

[21] 賴永祥編，〈「臺灣慣習記事」類目（一）（二）（三）〉，《臺灣風物》12 卷 3、4、5 期（1962），頁 25-39；頁 15-30；頁 33-35。

[22] 黃智慧，〈日本對臺灣原住民族宗教傳統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收於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 143-195；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於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誌。 在官方的調查研究方面，1898年以總督府殖產局前後任局長木村匡及柳本通義爲主，發起了蕃情研究會，名譽會長爲立見尙文男爵，會員有60餘人，分成13個部門進行調查計畫，並發行《蕃情研究會誌》，至1900年共出版4期。其後在1913年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內成立生蕃研究會，由民政長官擔任會頭，並發行會刊《蕃界》共3期。而伊能嘉矩除了由總督府殖產局出版其《臺灣蕃政志》（1904）外，並參與《臺灣總督府理蕃誌稿》（1911）的編纂工作。[23]

（三）「生物學政治」與「舊慣立法」：殖民地統治與臺灣慣習研究

1898年3月，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局長後藤新平（1857-1929）抵達臺北就任新職。[24]面對臺灣內部土匪、生番、惡疫、語言障礙、缺乏良港及交通不便等多重的挑戰，後藤建議兒玉取消了總督施政方針的例行演說，「以無方針爲臺灣統治方針」，主張在制定任何具體政策前，必須對各項問題進行徹底的調查與研究：

> 「殖民經營的大要，在於今日的科學進步，必須在建立於生物學的基礎。所謂生物學的基礎為何？科學生活方式的增進，如殖產、興業、衛生、教育、交通及警察等。均為開闢此基礎，以立足於生存競爭戰場，實現適者生存的法則。如同動物們適應寒暑饑渴等環境以生存，吾人應因時因地調整。克服各種困難，推動適當措施，在臺灣經營上發揚光輝。」[25]

在生物學政治的口號下，後藤除了擴大日本殖民地調查的規模，更賦予調查事業新的政策功能與學術意義。他在臺灣推動了三大調查事業，也就是1898-1904年的土地調查，1901-1919年的舊慣調查，以及1905年的人口調查。[26]，其

[23]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臺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8；松田京子，〈領臺初期における臺灣先住民調查——伊能嘉矩を中心に〉，《臺灣史研究》（日本臺灣史研究會）14（1997）：135-148； Paul Barclay, *Japanese and American Colonial Projects: Anthropological Typifi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24] 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於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臺北：國史館，2002），頁 1235-1259；小林道彥著，李文良譯，〈後藤新平與殖民地經營：日本殖民政策的形成與國內政治〉，《臺灣文獻》48 卷 3 期（1997），頁 101-121。

[25]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東京：勁草書房，1965）第二卷，頁 24-39。

[26]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以舊慣調查事業爲期最久，成果也最爲豐富。在後藤主導下，臺灣總督府先於1900年出版了《臺灣舊慣調查一斑》，並陸續成立臺灣慣習研究會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等重要官方和民間機構。

對於舊慣調查事業與臺灣統治的關聯，後藤在1901年接受東京日日新報的訪問中，詳細申論了調查事業與殖民地法律及經濟改革的必要性:[27]「如果我們無法了解土著慣習與地方制度，將不能對於今日臺灣經營上法律制度與經濟，提出切合新領土所需的改革。」後藤並臺灣舊慣調查事業的成員組成與執行方法，提出其見解，認爲不能僅仰賴地方官員的零星觀察。而需要專門學者的努力，來進行體系性分析與綜合。

後藤的臺灣舊慣調查事業，主要目的在於實現其基於生物學政治論所提出的「舊慣立法」主張，也就是將臺灣視爲有別於日本內地的「特殊法域」。[28]在臺灣舊慣調查事業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學者，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岡松參太郎（1871-1922）。岡松除了將民族法學及比較法制史的視野，引進臺灣舊慣調查事業外，更成爲後藤所提倡「臺灣統治法」的起草者。[29]

關於舊慣調查對於殖民地法制改革及統治政策的重要性，臺灣慣習研究會幹事長鈴木宗言，在《臺灣慣習記事》發刊詞中強調：

> 「民俗習慣乃與國家社會歷經幾多沿革與歷史發達的結果。故就時之古今，洋之東西，或國之南北，必有特異之習俗。此為歷史的必然，即使接壤比鄰之地亦不能免，更何況如臺灣？法律並非習慣，政事並非人情，然法律非淵源於舊俗不可，政事非以人情為根基不能成……聽聞英國在新領土印度之時，即有碩學緬氏前往，首先調查該地習俗，而後施政。此為重視民俗習慣之故，亦是英國殖民政策成功，成為今日大國之因。後世欲經營新領土者，自當以此為典範。」[30]

Edward I. Chen, "Gotô Shimpei, Japan's Colonial Administrator in Taiwan: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American Asian Review* 13（1）: 29-59（1995）.

[27]《臺灣慣習記事》第五號（1901 年 5 月），頁 24-38；第六號（1901 年 6 月），頁 25-35。

[28]春山明哲，〈明治憲法體制と臺灣統治〉，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4：統合と支配の論理》（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 31-50。

[29] 春山明哲，〈臺灣舊慣調查と立法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查と立案を中心に〉，《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6 號（1988），頁 81-114。吳豪人，〈ドイツ人種學的法學と『臺灣私法』の成立〉，《臺灣史研究》第 14 號（1997），頁 92-93。

[30]「發刊の辭」，《臺灣慣習記事》1：1，（1901），頁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後藤的離臺和階段性目標的完成，附屬在殖民地法制改革的臺灣慣習研究會也於1907年解散，並由《法院月報》等刊物接續其調查報導工作：[31]

> 「因現今有許多以舊慣為基礎所制訂的特別法，可以看出臺灣立法準備工作，已逐漸朝向法典調查方向進行。故本會向來以研究慣習、土俗及致力於法制資料收集的目的，可說已大體完成……目前已有宗旨相同的《法院月報》發行，研究慣習及調查法制的《臺灣慣習記事》應合併於《法院月報》，由其來承繼未了的工作。」

從上述討論中可以看到，臺灣舊慣調查事業的展開，其主因並非尊重及保存臺灣傳統風俗制度，而毋寧是基於「特別統治主義」立場，推動殖民地法律改革及經濟轉型的前提工作。諸如《臺灣私法》等舊慣調查事業的成果，除了扮演殖民地法制改革的政策功能，也建立了一套以歐陸法爲主的殖民知識系統和解釋典範。[32] 另一方面，臺灣在日本殖民地官僚和內地學者爲主的研究中，成爲被紀錄和分類的知識對象。在《臺灣慣習記事》中，關於漢人社會風俗和原住民生活慣習的調查報導，充滿了日本殖民者對於「他者」的觀察和異國情調的論述。[33]

總而言之，日治初期的臺灣民俗研究，爲官方殖民地調查與殖民地人類學的雙重政治和學術脈絡下的產物。由日本殖民官僚、法院和警察關係者爲主體的臺灣「舊慣」調查，構成日治時期官方臺灣民俗研究的主要內涵。此一傳統除了慣習研究會等機構出版物外，如佐倉孫三《臺風雜記》（1903）、小林里平《臺灣歲時記》（1910）、手島兵次郎《臺灣慣習大要》（1913）、丸井圭次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1919）、片岡巖《臺灣風俗誌》（1921）、柴田廉《臺灣同化策論》（1923）、志波吉太郎《臺灣的民族性與指導教化》（1927）、山根勇藏《臺灣民族性百談》（1930）、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喪祭與年中記事》（1934）與東方孝義《臺灣習俗》（1942）等作品，不僅成爲殖民治理的知識基礎，更是日本殖民論述的重要環節。[34]

---

[31] 《臺灣慣習記事》7：8，（1907），頁 4-5。

[32]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

[33] 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233-259。

[34]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 卷 3 期（2004），頁 7-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戰爭動員與地方文化：殖民地知識人與《民俗臺灣》

在1940年代出現的《民俗臺灣》，與1900年代的《臺灣慣習記事》有著迥異的時代背景和學術政治脈絡。在殖民地政治史方面，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於1919年抵臺，並推動各項內地延長政策。而臺灣漢人的抗日運動在1915年西來庵事件後，由傳統的武裝起義，轉變爲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爲主的近代政治鬥爭。日本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統治，則在1930年霧社事件後，採取了新的理番政策方針。[35] 在殖民地文化史方面， 則有臺灣留學生與殖民地菁英知識份子，在1920年代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等團體，積極推動文化啓蒙運動。[36] 在殖民地學術史方面，則有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取代了前期以臺灣總督府官僚爲主的殖民地調查研究。[37] 至1930年代因爲中日戰爭的爆發的展開，進入戰爭動員體制與皇民化運動時期。[38] 以下試先介紹臺北帝國大學的臺灣研究，並討論《民俗臺灣》雜誌的時代意義與學術特色。

（一）臺北帝國大學與臺灣原住民研究

如前文所述，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展開，並非以臺灣漢人爲唯一研究對象。平埔及高山各族臺灣原住民的調查與分類，構成了殖民初期臺灣總督府理番政策的主要課題。1930年的霧社事件，除了造成臺灣總督和高層官僚的更動，更促使日本殖民政府重新檢討其理番方針。臺灣總督府理蕃課於1931-36年間，進行大規模「蕃地開發調查」，並出版《蕃人所要地調查》、《蕃人調查》及《高砂族調查書》）（1939）等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於1928年設立後，文政學部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以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等人爲核心，進行殖民地人類學的調查研究。值得注

[35] 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民族運動》（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1987）。

[36]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

[37] 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1。

[38]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臺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 刀水書房，1996）；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的是，移川等人的主要學術對象，並非臺灣漢人社會，而是原住民研究。1930-1932年間，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接受前總督上山滿之進的補助，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並於1935年出版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以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等兩部巨著，並分別獲得日本學術院賞及恩賜賞。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自1931年起發行《南方土俗》，至1942年共出版6卷24期，最後一卷改名爲《南方民族》。臺北帝大除土俗人種學及語言學兩研究室外，如社會學研究室岡田謙，以及農業經濟研究室奧田彧與增田福太郎等學者，都投入了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此外如臺北高等學校出身的鹿野忠雄等人，對於臺灣南島民族誌和東南亞民族學都有重要貢獻。[39]

（二）《民俗臺灣》與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民俗研究

《民俗臺灣》的時代背景，是日本在臺灣的皇民化運動與臺灣民俗急速消滅的危機。1936年由總督小林躋造所推動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內容包括廢止新聞的漢文欄、推行常用國語、強制參拜神社、寺廟整理、推行正廳改善運動、廢止中國式的風俗習慣、實行日本式的日常生活、改成日本式的姓名等社會動員和同化政策。1940年7月，近衛文麿第二次內閣成立， 10月成立大政翼贊會，作爲與原有政府官廳並存的全國性動員體系。臺灣殖民地也在11月由長谷川清出任臺灣總督，並成立皇民奉公會。1941年1月號的總督府機關雜誌《臺灣時報》出版〈皇民化的再檢討特輯〉，分別檢討皇民化政策下的改姓名、經濟生活、語言、家屋建築、寺廟、農村與農民問題。而中村哲的總論〈作爲文化政策的皇民化問題〉，則主張皇民化政策應考慮臺灣的特殊狀況，與內地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地方文化運動相呼應。[40]

《民俗臺灣》創刊於1941年7月，在物資缺乏的戰爭時期持續發行至1945年1月總共發行43期（第44期未出刊）。雜誌的主要推動者爲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與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的池田敏雄。在籌辦這個雜誌之前，岡田謙、須藤利一、金關丈夫、陳紹馨、黃得時、萬造寺龍等日臺民間知識人，聯名發表雜誌發行的趣意書。提到臺灣舊慣即將消滅的危機感，以及民俗記錄研究的重要性：

---

[39] 劉斌雄，〈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收入黃應貴主編《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1986），頁 69-81。

[40]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臺灣の「大東亞戰爭」：文學、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231-2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島舊有陋習弊風快速被打破，島民得以大為享受近代文化之恩惠，此固為應甚歡迎者；但同時那些全無弊害的舊慣，卻也不免因此被犧牲而湮滅。……已有記錄與研究能力的文明國民，具有應該記錄、研究一切現象的義務。將陋習當作陋習，弊風當作弊風記錄研究，不但是我國民的義務；而就現在我國民將伸展國力於南方來說，不論是華南或是南洋，最有提攜之機會與必要性的便是支那民族。為了瞭解他們，必須預先瞭解臺灣本島人。此一方便也是我國民冠絕於他國的優勢。」

相較於同時期由在臺日人西川滿主持的《文藝臺灣》，《民俗臺灣》的執筆者包括了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者、在臺的日本文化人和臺灣本地知識人。其中臺灣人作者，有地方仕紳、醫生、律師、記者和作家等多人，並有數位女性。在內容方面，《民俗臺灣》以研究介紹臺灣風俗慣習爲宗旨，約可分成以下三類：[41]

投稿文章：有關民俗的研究記錄、文獻介紹、書評問答等。內容包括日常生活禮俗、歌謠俚諺、民間傳說、民間工藝、鄉土歷史、語言文字、社會制度等各類，亦有關於考古發掘、自然誌與原住民習俗的報導。

專欄文字：包括卷頭語（金關丈夫等）、攝影集、民藝解說（松山虔三）、民俗圖繪（立石鐵臣）、文獻書評、各地通信、與「亂彈」及「點心」等時事短評。

特輯：如土林、臺南和北門等地方、新年風俗和俚諺等、以及童養媳制度等專題報導和討論。

（三）「研究與愛」：《民俗臺灣》與臺灣知識人

作爲皇民化時期地方文化保存的民間期刊，《民俗臺灣》除了必須接受總督府的出版檢閱，更時常面對來自日本殖民者的質疑。池田敏雄在戰後的回顧談中，用了相當的篇幅來說明當時《民俗臺灣》在存續期間受到來自官方及皇民化論者的強大壓力，以及雜誌編輯與作者必須迎合時局文字的困難和苦衷。[42]

[41]池田麻奈〈《民俗臺灣》執筆者別作品一覽〉，《民俗臺灣》第 5 卷，索引（臺北：南天，1998 復刻版），頁 1-40。〈《民俗臺灣》第一至五卷總目錄〉，《臺灣風物》12 卷 2 期（1962），頁 15-32。

[42]池田敏雄，〈植民地下臺湾の民俗雜誌〉，《臺湾近現代史研究》4（1982），頁 121-151。池田麻奈，〈『植民地下臺湾の民俗雜誌』解題〉，《臺湾近現代史研究》4（1982），頁 109-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俗臺灣》正式創刊前的1941年5月，臺灣知識人楊雲萍發表以〈研究與愛〉爲題的文章，評論金關丈夫等人所發表的《民俗臺灣》趣旨書。他從臺灣人的立場，批判金關等人只措意於「紀錄」即將消失的臺灣民俗的趣旨：

> 「一向被相當閒卻、冷視的『臺灣研究』，最近見見新的機運，例如『文學』、『民俗』，這未嘗不是我暗地感到高興的。但是我心裡卻也不免有些不平者，那是彼等開始染手研究時，竟有抱持冷淡的高姿態或機械的態度・方法者。連『白話文』、『臺灣語』都不懂，竟然斷定：『白話文』的作品『多是模仿的』，或是此後將研究『臺灣舊慣』，卻已經就說『並不惜湮滅』。...希望此等『學者』、『研究家』諸氏，今後稍稍要有溫暖的理解與愛，和謙遜。」[43]

楊雲萍的評論獲得了金關的正面回應，他強調《民俗臺灣》的發行，不僅在於防止臺灣舊慣的湮滅，更有對於臺灣民眾的愛，和理解其民俗的積極意義。此一論爭除了釐清了《民俗臺灣》在臺灣民俗研究上的動機和目標，更確立了日臺民間知識人共同合作和交流的方向。面對著戰爭的困難時局，以及皇民化論者的質疑反對，《民俗臺灣》的主要成員除了抱持著民俗即將消滅的危機感，更展現出積極搶救文化的使命感。另一方面，隨著大東亞戰爭的激烈化，《民俗臺灣》也面臨了配合日本南進政策的學術挑戰。

（四）《民俗臺灣》與大東亞民俗學

1942年日本成立大東亞省，《民俗臺灣》雜誌封面於10月號起，由強調「臺灣與相關地方風俗習慣的研究介紹」，改成「南方文化的研究介紹」。原本由業餘民俗愛好者組成的民間雜誌，也因爲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參與，而受到日本內地民俗學界的注目。柳田與臺灣研究者伊能嘉矩爲密友，曾共同討論伊能故鄉日本岩手縣遠野市的風俗，並在伊能死後，協助出版其代表作《臺灣文化志》。[44] 柳田更與前臺灣總督安東貞美爲叔姪關係，曾於1917年間

[43] 金關丈夫，「巻頭語」《民俗臺灣》1（1941）：1；楊雲萍，「研究と愛」《民俗臺灣》2（1941）：43。「民俗への愛——楊雲萍君に答ふ」《民俗臺灣》2（1941）：43-5。

[44] 岩崎敏夫，《柳田國男と遠野物語》（遠野市立博物館，1985）；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訪問臺灣，並探訪中部霧社番地及西來庵事件遺址。[45]

1943年10月，柳田國男與《民俗臺灣》核心人物金關丈夫、中村哲及岡田謙等人，於東京舉辦座談會。討論內容並以「大東亞民俗學的建設與《民俗臺灣》的使命」爲題出版於1943年12月號的《民俗臺灣》。柳田在會中提示三個可以作爲共同調查的主題：對異者的接待、祖先觀念、結婚道德。並臚列出共同的民俗採集調查項目，分別在東亞各地調查，然後再以調查結果進行比較。[46]1944年1月，金關丈夫列名其中的全國性「柳田國男先生古稀紀念會」終於發表了〈國際共同研究課題的提案〉，內容就是在柳田國男提示的那3個主題範圍內具體地列出16個項目。在大東亞各地區創立利用「日本語」收集、分類、分析的「民俗學」，然後作爲與「日本民俗學」比較、對照的研究對象。[47]

《民俗臺灣》在戰爭後期的轉向，可以對照下列兩篇文字，一是1941年7月創刊號的〈編輯後記〉：

> 「研究雜誌，即 Academic 的民俗雜誌，本島已有《南方民族》。本雜誌並不是為了成為那樣的雜誌，而是希望達成另外的使命而產生的。即希望出之以比較輕鬆、可親的涼臺閒談是氣氛，在不知不覺間提高世人對本島民俗的關心。我們歡迎這種輕鬆氣氛的稿子。向本期這樣都是些力作，或許反而不能充分體現我們的趣意。...我們特別期待各地隱藏著的有志者，希望您們站出來說：我們這個地方有這喲！並不斷地將它記錄下來投稿。...鑑於本雜誌的特殊使命，我們切望各地有志者積極的投稿，希望不侷限地域地，不分農山漁村，光犯地從全島各地都有人提出報告來。」

創刊號中作爲業餘民俗愛好者園地的期待，至1943年12月號的〈編輯後記〉時，則轉變爲對於「大東亞民俗學」的使命感：

> 「接到大東亞省設立的報導，令人覺得吾人「東亞乃是一體」的信念已成為不能動搖的東西。...如今已不用更加說明，研究臺灣的民俗，並不單只是侷限在臺灣的問題。由於研究臺灣的民俗，才使吾人得以對完成大東亞民俗學做出貢獻。雖然向來並不是絕無認為研究本島民俗與島民的皇民化正有那麼一些抵觸者，但作為大東亞之

[45] 池田敏雄（程大學譯），〈柳田國男與臺灣：西來庵事件的插曲〉，《臺灣文獻》32 卷 3 期（1981），頁 180-202。

[46]「座談会——柳田國男氏を圍みて」《民俗臺灣》30（1943）：頁 2-15。

[47]「柳田國男氏古稀記念會」《民俗臺灣》34（1944）：43；柳田國男先生古稀記念會，「國際共同研究課題の提案」『民俗臺灣』35（1944）：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盟主的我們日本人，不只是臺灣民俗，也必須與而且有義務闡明中國民俗、南洋民俗、印度民俗、澳洲民俗等共榮圈內之民俗。以臺灣民俗的研究，來作為此廣大之必要的一端，完成其重要任務的一端，是我們臺灣島民當然的職分。」

關於《民俗臺灣》的轉向及其與日本帝國「大東亞民俗學」的關聯，在1990年代曾引發日本新生代學者川村湊與《民俗臺灣》成員國分直一的論爭，成爲殖民地人類學史的重要課題。[48] 相較於從日治初期具有殖民地文化統治和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民俗臺灣》成爲皇民化運動時期日臺知識人對於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重要案例，也反映出日本戰爭動員體制下，由臺灣總督府、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民間知識人、以及日本內地學界所構成的特殊文化政治生態。

（五）戰後臺灣民俗學傳統的斷裂與混融

萌芽於日本殖民後期的臺灣民俗研究，在戰後並未能發展成爲獨立的主流學科。雖然當時參與《民俗臺灣》調查報導的臺灣知識人，如楊雲萍、陳紹馨、黃得時、戴炎輝及曹永和等人，在戰後均成爲從事臺灣歷史及社會文化研究的主要人才。 然而在1953年出版的《季刊民族學研究》「臺灣研究特集」（第18卷第1、2期合刊），便未將民俗學列爲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49]而《民俗臺灣》時期的調查報導傳統，除了地方文獻會等機構外，則僅能由《公論報》臺灣風土版等報章專欄（1948年發行至1955年停刊，共195期），以及《臺灣風物》等民間刊物（1951年創刊迄今）加以延續，不絕如縷。[50]

另一方面，相較於東亞地區中日韓等國民俗學的延續發展，戰後臺灣民俗研究傳統，亦出現交叉傳遞和移植混融的現象。源自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歌謠研

[48] 三尾裕子，〈以殖民統制下的「灰色地帶」作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臺灣文獻》55 卷 3 期（2004），頁 26-61。川村湊 《「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東京：講談社 1996）；国分直一，「民俗臺湾の運動は何であったか——川村湊氏の所見を巡って」，《シニカ》8：2，（1997），頁 122-7。

[49] 臺灣研究特集的題目和作者為：高砂族的分類（馬淵東一）、語言學（淺井恵倫）、宗教生活（古野清人）、物質文化（宮本延人）、生業（瀨川孝吉）、先史考古學（金關丈夫、國分直一）、民族學（宮本延人）、社會人類學（馬淵東一）、以及體質人類學（金關丈夫）。

[50] 阮昌銳，〈臺灣民俗研究的過去與未來〉，《臺灣文獻》36 卷第 3-4 期（1985），頁 25-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會，與1920年代後期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與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學術傳統，則隨著大陸學者渡海流亡而輾轉引介至臺灣。[51] 例如中國民俗學者婁子匡與朱介凡等人，除了致力蒐集臺灣鄉土傳說與歌謠俚諺外，並與歐美漢學家如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等人合作出版「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刊」等資料叢書。[52] 雖然在1970年代濁大計劃期間，人類學者王崧興等人曾試圖結合中國社會人類學、日本民族學及歐美區域研究的理論傳統，對於臺灣漢人社會文化進行集體研究。[53] 但關於臺灣地方宗教、[54]民間文學、[55]以及民俗曲藝等課題的討論[56]，長期以來仍附屬於中國俗文學、中國地方史及漢人社會研究等不同學科領域。直至1980年代臺灣本土研究風潮興起，諸如民間學者劉還月等人投入平埔族群與常民文化的田野調查[57]，而人類學者林美容等人除探討臺灣村庄史和民間信仰圈，更重新重視劉枝萬等臺灣民俗研究先驅的學術業績，[58]並追求具臺灣主體性的本土民俗學典範與論述。[59]

[51] 張紫晨，《中國民俗學史》（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

[52] 婁子匡、朱介凡編著，《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臺北，正中書局，1987）。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臺灣唱本提要》（臺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

[53] 黃應貴・葉春榮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

[54] 林美容編，《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增訂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

[55] 胡萬川，〈臺灣民間文學的過去與現在〉，《臺灣史料研究》 第 1 期（1993），頁 23-30。胡萬川，〈民族、語言、傳統與民間文學運動——從近代的歐洲到日治時期的臺灣〉，胡萬川、呂興昌、陳萬益總編輯，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頁 1-22 。

[56] 王秋桂編，《民族與民俗》（臺北：稻香，1994 年）。

[57] 劉還月，《臺灣民俗田野行動入門》（臺北：常民文化，1999）。

[58] 陳美蓉，〈民俗、信仰與宗教—劉枝萬先生專訪〉，載《臺灣史料研究》第六期（1995），頁 142-152。

[59] 林美容，〈臺灣民俗學史料研究〉，《慶祝建館八十週年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625-6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語

本文以1900年代的臺灣舊慣調查事業與1940年代的臺灣民俗保存運動等兩個代表性個案爲例，說明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文化政治的歷史關聯，並指出戰後臺灣民俗研究特殊發展軌跡。民俗研究是歐洲近代學術的一環，與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歷史有密切關聯。而東亞地區的民俗研究，更由於近代日本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的背景，而呈現出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雙重歷史特徵。作爲近代化過程中「被發明的傳統」，日治時期臺灣的民俗調查研究，一方面是日本文化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知識活動，一方面也成爲臺灣殖民地菁英建構文化及鄉土認同的重要途徑。

筆者認爲，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臺灣民俗研究，是日本殖民統治和近代學術發展雙重脈絡的歷史產物，而二十世紀初期日臺殖民知識和權力關係的轉變，除了使得「文化」成爲臺灣殖民地政治的重要場域。將「舊慣」與「民俗」視爲兩種殖民知識與實踐類型加以比較對照。從殖民初期以殖民官僚及政策取向所主導，具有殖民地文化統治和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轉變戰爭動員時期由日臺民間知識人合作進行，源自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業餘「民俗」研究。上述日治時期的臺灣民俗研究史，實反映出近代臺灣的殖民地學術脈絡的轉變與文化政治過程的差異。

另一方面，在戰後臺灣雖有中國地方歷史、民間宗教與通俗文學藝術等個別研究，但萌芽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民俗學傳統並未能發展爲獨立的民俗學門。「爲何戰後臺灣只有鄉土史和民俗研究，而沒有臺灣民俗學？」筆者認爲臺灣民俗研究的殖民歷史背景，以及戰後臺灣學術傳統的斷裂，是此一現象的主因。隨著日本戰敗和大東亞民俗學的崩解，日本民俗學的傳統並未能在臺灣延續發展。而中國民俗學的傳統雖在1949年國府遷臺後播遷至臺灣，然政治戒嚴等因素卻使得臺灣研究長期以來成爲學術伏流。相較於東亞地區中日韓等國民俗學的延續發展，上述臺灣民俗研究傳統交叉傳遞和移植混融的現象，實爲戰後臺灣政權轉移與學術文化變遷的特殊歷史產物。筆者未來將繼續透過代表人物作品個案的分析，以及東亞區域學術傳統的比較，對於臺灣歷史民俗研究及本土學術發展史進行系列探討。

（責任校對：吳品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臺灣慣習記事》，臺北：古亭書屋，1969年影明治34年本。

《民俗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復刻版。

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東京：講談社，1996。

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

王秋桂編，《民族與民俗》，臺北：稻香，1994。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88。

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臺灣唱本提要》，臺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

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民族運動》，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1987。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灣史》，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林美容編，《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增訂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1990。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臺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岩崎敏夫，《柳田國男と遠野物語》，遠野市立博物館，1985。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臺灣大學，1986。

姜尚中，《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彼方へ——近代文化批判》，東京：岩波書店，1996。

婁子匡、朱介凡編著，《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臺北，正中書局，1987。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1987。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臺北：文海，1972。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1

張紫晨，《中國民俗學史》，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劉還月，《臺灣民俗田野行動入門》，臺北：常民文化，1999。

劉還月，《臺灣人的歲時與節俗》，臺北:常民文化，2000。

戴國煇，《臺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臺北：遠流，1985。

瀨川清子、植松明石編，《日本民俗學のエッセンス：日本民俗學の成立と展開》（增補版），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東京：勁草書房，196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Tani E.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Surrey: Curzon, 1999).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ernard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Press, 1996).

Niclolas Dirks ed.,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Douglas Fix, Formosa: Nineteenth-century Images: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

Stuart Hall et al. eds.,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6).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ih-ming Ka,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Marilyn Ivy, *Discourse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Stephen Vlastos, ed., *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二、論文

（一）一般論文

〈《民俗臺灣》第一至五卷總目錄〉，《臺灣風物》12卷2期（1962），頁15-32。

三尾裕子，〈以殖民統制下的「灰色地帶」作爲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頁26-61。

小林道彥著，李文良譯，〈後藤新平與殖民地經營：日本殖民政策的形成與國內政治〉，《臺灣文獻》48卷3期（1997），頁101-121。

山根幸夫，〈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の成果〉，收入山根幸夫，《論集：近代中國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76），頁79-122。

池田麻奈，〈『植民地下臺湾の民俗雜誌』解題〉，《臺湾近現代史研究》4（1982），頁109-20。

池田麻奈〈《民俗臺灣》執筆者別作品一覽〉，復刻版《民俗臺灣》第5卷，索引（臺北：南天，1998），頁1-40。

池田敏雄著，程大學譯，〈柳田國男與臺灣：西來庵事件的插曲〉，《臺灣文獻》32卷3期（1981），頁180-202。

池田敏雄，〈植民地下臺湾の民俗雜誌〉，《臺湾近現代史研究》4（1982），頁 121-151。

阮昌銳，〈臺灣民俗研究的過去與未來〉，《臺灣文獻》36卷第3-4期（1985），頁25-51。

李季樺，〈他者の視線からみだ19世紀末から20世紀初頭の臺灣における「迷信」の生成：臺灣の舊慣、民俗誌史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現代臺灣研究》18（1999），頁33-50。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於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11-28。

吳密察，〈臺灣の植民地型近代化への再認識〉，比較史、比較歷史教育研究會編，《黑船と日清戰爭》（東京：未來社，1996），頁289-298。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臺灣の「大東亞戰爭」：文學、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231-265。

吳豪人，〈ドイツ人種學的法學と『臺灣私法』の成立〉，《臺灣史研究》第14號（1997），頁92-93。

林美容，〈臺灣民俗學史料研究〉，《慶祝建館八十週年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625-645。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頁7-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松田京子，〈領臺初期における臺灣先住民調查——伊能嘉矩を中心に〉，《臺灣史研究》第14號（1997），頁135-148。

国分直一，〈民俗臺湾の運動は何であったか——川村湊氏の所見を巡って〉《シニカ》8（2）（1997），頁122-127。

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13卷3期（2002），頁1-2。

胡萬川〈臺灣民間文學的過去與現在〉，《臺灣史料研究》 第1期（1993），頁23-30。

胡萬川〈民族、語言、傳統與民間文學運動——從近代的歐洲到日治時期的臺灣〉, 胡萬川、呂興昌、陳萬益總編輯，《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頁1-22 。

春山明哲，〈臺灣舊慣調查と立法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查と立案を中心に〉，《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6號（1988），頁81-114。

春山明哲，〈明治憲法體制と臺灣統治〉，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4：統合と支配の論理》（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31-50。

陳美蓉，〈民俗、信仰與宗教——劉枝萬先生專訪〉，載《臺灣史料研究》第六期（1995），頁142-152。

張隆志，〈重構殖民者的歷史圖像：後藤新平研究芻論〉，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121-143。

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於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臺北：國史館，2002），頁1235-1259。

張隆志，〈殖民現代性分析與臺灣近代史研究〉，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頁133-160。

張隆志，〈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359-383。

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頁233-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智慧，〈日本對臺灣原住民族宗教傳統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收於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143-195。

劉斌雄，〈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收入黃應貴主編《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1986），頁69-81。

賴永祥編，〈「臺灣慣習記事」類目（一）（二）（三）〉，《臺灣風物》12卷3、4、5期（1962），頁25-39；頁15-30；頁33-35。

Edward I. Chen, "Gotô Shimpei, Japan's Colonial Administrator in Taiwan: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American Asian Review* 13（1）（1995）: pp29-59.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1997）: 163-183.

Timothy Tsu,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old customs'", in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London:Curzon,1999）, pp. 197-218.

Tsu Yun-Hui, "For Science, Co-prosperity, and Love: The Re-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Folklore and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n War," in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Wartime Japanese Anthropolog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Osaka, Japan :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3.）, pp. 189-207.

（二）學位論文

王昭文，〈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李季樺，〈文明と教化——19世紀臺湾における道徳規範の構築と変容〉，東京大學博士論文，2006。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陳豔紅，〈領臺時代の臺灣と日本；《民俗臺灣》を中心に〉，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鄭政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1896-192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爲中心》，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1。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爲分析場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博士論文，1999年。

Paul Barclay, "*Japanese and American Colonial Projects: Anthropological Typifi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Alan Christy, "*Representing the Rural: Place as Method i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Native Ethnology, 1910-19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Old Customs" to "Folklore": Modern Japanes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Colonial Taiwan

Chang, Chia-ling*

Abstract

Folklore studies became a modern discipl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studies in East Asia has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aiwanese folklore studies by comparing two representative cases, namely the investigation of old customs in 1900s and the collection of local folklores in the 1940s. From official knowledge project and instrument of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to local intellectual initiatives and efforts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folklore studie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changing knowledge/power relations but became a contested realm of cultural politics in colonial Taiwan. Unlike the folklore studies in Japan, China, and Korea, this colon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intellectual ruptures after WWII account for the vicissitudes of post-war Taiwanese folklore studies and offer a vivid example in understan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disciplines in East Asia.

Keywords: Investigation of "old customs", *Folklore Taiwan*, mod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lonial cultural politics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